

元代诗歌中“瘴”的文化内涵

——以《元诗选》为主要分析材料

王绮雯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元代疆域空前,民族多元,诗歌中对于“瘴”的书写相比唐、宋而言有沿袭亦有新变。检索《元诗选》可知,元诗中的“瘴”在出现频率、表述方式、涉及地域等方面与唐宋时期差别不大;在文化语境、诗人心态和写作群体的身份等方面,则有可进一步探索的空间。元代含“瘴”诗歌中,安南诗与送别诗的数目最为可观;诗人面对“瘴”时的厌恶与恐惧心理有所缓解,有平和、乐观心态者增多;元代蒙古色目诗人与安南籍诗人的诗歌中皆有“瘴”出现,前者使用时与汉族诗人一样,部分带有偏见与歧视色彩,后者使用时则有意避免其中的贬义。

关键词:瘴; 元代诗歌; 安南诗; 送别诗; 蒙古色目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20)06-0057-05

有关“瘴”的研究,学界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其脉络大致是由医学、地理学分析转向文化学、社会学解读。冯汉鏞《瘴气的文献研究》认为,瘴气是我国南方流行的多种疾病的统称,包括疟疾、痢疾、温病、脚气、沙虱热、中毒、喉科病、痈疽、指头感染、脱发等。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则指出:“所谓瘴气与瘴病,其实只是一个基于部分事实的、建立在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基础上的文化概念。”^[1]学界研究旨趣的转变激发了更多跨学科的有益探索,研究者的目光也由医书、史料转向诗文,代表性的论文有严赛《〈全唐诗〉中“瘴”的含义》等。然而,在各类有关“瘴”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元代的极少,仅左鹏《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等少数文章中有所提及。元朝疆域空前,民族多元,理应得到学界更多关注。笔者拟从文化学角度出发,对元诗中的“瘴”进行初步探讨。

一、元诗中“瘴”的使用

杨镰主编的《全元诗》出版于2013年,收录元代近5000位诗人的约132000首诗,讨论元代诗歌理应以此为据。然与全唐、全宋诗歌不同,据笔者所知,全元诗尚无相应的检索系统,且《全元诗》中未

收录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安南籍诗人的诗作。故出于可行性考虑,本文暂以《元诗选》作为主要材料进行分析。《元诗选》的体例介于选本性总集与全集性总集之间^①,《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矣”^{[2]1731},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元诗选》初、二、三集、癸集和补遗总计收录2823位诗人的28271首诗^②,以此书为样本考察元诗中“瘴”的风貌亦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通过“中华经典古籍库”检索可知,《元诗选》中出现“瘴”154处,涉及诗歌149首^③,约占诗歌总数的0.527%。再上溯唐、宋诗歌,“全唐诗分析系统”中收录唐诗57592首,检索“瘴”得306条信息,占比约为0.531%;“全宋诗分析系统”中收录宋诗254240首,检索“瘴”得1040条信息,占比约为0.409%。由此观之,从唐至元,诗人使用“瘴”的频率基本平稳,没有因疆域变化、人口迁徙等社会因素而出现较大波动,这也表明“瘴”已由最初之纪实泛化为一种文化观念,进而成为诗歌中一类稳固的意象。

《元诗选》中包含“瘴”的149首诗歌分属97位诗人,且受编纂体例的影响,分布较为平均,每位诗人约1~3首,唯有萨都刺、张翥、李京为4首,范梈

收稿日期:2020-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元末明初蒙古色目士人的生存状态与文学创作研究”(17CZW028)

作者简介:王绮雯,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为6首,陈孚最多,为12首。

据统计,有关“瘴”的表述,《全唐诗》中有近50种,《全宋诗》中有100余种,而《元诗选》中所见有35种,具体归类统计(括号内为使用次数)如下:瘴雨(22)、瘴烟(19)、瘴海(15)、瘴(14)、瘴疔(12)、瘴雾(11)、瘴云(9)、瘴江(5)、瘴岚(4)、烟瘴(4)、瘴氛(3)、炎瘴(3)、瘴尘(3)、海瘴(2)、瘴乡(2)、瘴天(2)、瘴溪(以下均为1次)、岚瘴、晓瘴、氛瘴、瘴气、瘴母、疔瘴、瘴土、瘴茅、茅瘴、青草瘴、毒瘴、野瘴、瘴黑、瘴露、瘴淫、瘴颜、瘴焰、瘴魂。以上表述虽有80%已见于唐、宋诗歌中,却依然存在着全新的搭配。严赛曾将“瘴”的表述分为与自身属性(如炎瘴),与山水、树林(如瘴江),与自然气象(如瘴雨),与疆域、地域(如瘴乡),与时间(如晓瘴),与生物(如椒瘴)连用六类。宋诗相比唐诗增加了与人的身体和生活相关的词汇,如瘴面、瘴发、瘴俗、瘴酒等。元诗与唐、宋诗歌相比虽未增加新的种类,却在多个种类下开拓了新的词汇,如与自身属性连用的“野瘴”、与自然气象连用的“瘴露”、与人相关的“瘴颜”等。一方面,这可见出“瘴”异常强大的构词能力,诗人可以自如地用之表情达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面对“瘴”时心态的转变:起初因惧怕,关注重心全在物本身,构词的语汇也多围绕“瘴”或与“瘴”相关;宋元时期人们逐渐产生出战胜“瘴”之勇气,使用“瘴”时也敢于将其用作修饰语以形容自身。例如,宋释德洪有“霜须瘴面老垂垂”^{[3]15249},元陈孚有“笑掬清波洗瘴颜”^{[4]248},“瘴”虽难脱负面意义,但可怖之面目已被削弱,正逐步向普通的形容词转化,且与宋诗相比,元诗更显乐观心态。

《元诗选》中149首含“瘴”的诗歌多数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涉及越南北部以及我国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海南、福建、湖南、江西、浙江等南方地区,且主要集中在云南、广东、广西、福建四省。仅就诗歌反映的情况而言,相比于唐宋时期,元时“瘴”分布的地域并未因经济开发、环境改善而逐渐缩小,就连东南地区也依然包含在内,甚至有零星诗歌与江南以北的地区相关。前辈学者已然指出,自瘴气说产生以来,“瘴”的地域分布总体呈现扩大趋势,其原因可归结为对“瘴”含义的承袭与引申,即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将其他地方视为边远荒蛮^④。元诗中亦不乏此类现象,如郝经《仪真馆中暑一百韵》中有“晓瘴煤生柱,晴霾土抹墙”^{[5]425},仪真馆在今江苏仪征,元时应不属于瘴区,诗中之“瘴”当是诗人被软禁真州期间苦闷心境的投射。

此外,元诗中也反映出时人已有关于瘴病的病

理学知识积累并掌握了一些防治方法,如“茶有茱萸敌瘴烟”^{[5]785}、“酒为瘴来须强饮”^{[6]77}、“仍闻薏苡能御瘴”^{[7]1837}等,能够以茶、酒和薏苡来抵御瘴气。邓赉《送医学教授陈杏林之潮州》更有“不用越巫驱瘴疔,家家传取卫生篇”^{[7]617},体现出先进而正确的医学观念。

总之,元诗中涉及“瘴”的概况与唐、宋诗歌差别不大,故而从略,后文将主要围绕元代含“瘴”诗歌独特的文化风貌展开。

二、元人使用“瘴”的文化语境与心态

唐诗中多将瘴气与瘴病视作苦难,表现出畏之如虎的心态,如白居易诗言“瘴乡得老犹为幸,岂敢伤嗟白发新”^{[8]4916}。至宋时,面对瘴气与瘴病,部分诗人呈现出乐观旷达、随遇而安的精神面貌,如苏轼诗有“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3]9551}。这是一种由自然向内心的转变,宋人重视修心以克服困难,与其时理学、心学的兴盛不无关系。而观元诗,诗人使用“瘴”的文化语境与心态又有新变。

《元诗选》149首含“瘴”诗歌中,有近30首属于元代安南诗。安南,古称交趾,在今天的越南北部。元朝与安南陈朝的政治外交频繁,留下了诸多与出使安南有关的诗作。汤开建的《元代安南诗辑校》(《元史及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十四辑,南方出版社,2001年)中将此类诗歌分为元人使安南诗、元人送使安南诗及与安南人酬唱诗、安南名人诗三部分。每部分均不乏涉及“瘴”者,《元诗选》中亦有收录,这里先看元人使安南诗及元人与安南人酬唱诗。首先,元代使臣出使安南及回国途中创作的纪行诗中多见瘴意象,如陈孚的《宾州》《邕州》《江州》《度三花岭》《思明州》(其四)、《度摩云岭至思凌州》《交趾支陵驿即事》《老鼠关》《交州使还感事二首》,以及傅若金的《桂林》《桂林喜吕仲实金宪至》等。诗人出使安南途经燕赵、中原、荆楚、岭南四个文化区,由以上诗题可知,瘴意象主要集中于岭南地区的景观书写中,如“瘴雨飞为尘,鸛鹳声啾啾”^{[4]239}、“千年毒瘴郁不消,怒入老枫结丹瘿”^{[4]241}等,诗人通过描写异域景观的陌生、奇特、恶劣来传达羁旅之苦与家国之思。陈孚诗中多有“洗炎瘴”“洗瘴颜”“洗瘴氛”的表述,还言“已幸归来身健在,梦回犹觉瘴魂惊”^{[4]249},可以想见诗人排斥、恐惧与使命感交织的复杂心理。其次,元人与安南人的酬唱诗中亦有瘴意象出现。李思衍《世子燕席索诗》云“乾坤气运会贞元,皓月腾空息瘴烟”^{[4]181},以天象变化导致瘴烟消失喻指元朝会使安南荒蛮落后的面貌得到改

善。陈孚《交趾伪少保国相丁公文以诗饯行因次韵》云“一雨随车洗瘴烟,大鹏还击水三千”^{[4]248},以瘴烟被大雨洗净反映诗人即将归国的喜悦。杨宗瑞《答太子世子韵》云“奉旨遄驱海上山,朔风初作瘴烟寒”^{[7]334},言自己奉旨出使,一路跋山涉水,又遇凛冽寒风,瘴烟弥漫,可见艰辛。

送别诗是元代含“瘴”诗歌中的重要门类,《元诗选》中所见约40首(包括部分安南诗),占比较高,送别的原因主要有任官、出使、出征、归去等。首先,诗人常在想象友人旅途环境时用到瘴意象,如陆友《送赵子期使交趾》云“瘴雨侵榕叶,腥风度竹枝”^{[8]517},写瘴雨侵蚀榕树的枝叶,竹枝在带有腥味的风中摇摆,意在展现赵期颐出使旅途的艰辛。其次,有较多送别诗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瘴被清除”的意象,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自然条件的促成,如黄真仲《送孙彦周赴南雄路同知三首》(其三)之“南州得冰雪,瘴雾行以清”^{[7]562};第二,诗人的真挚祝愿,如陈旅《送海丰刘巡检》之“浦屿烟霞远,村墟瘴疠除”^{[5]1319};第三,赞扬友人的美好品质,宽慰其能以自身品格抵御污浊之气,如赵孟頫《送翟伯玉云南省都事》之“只应清淑气,不受瘴溪烟”^{[5]562};第四,以“瘴”喻指任职地区的落后状况或征战中的敌对势力,通过描写清除或压制“瘴”来表达对友人能够有所作为、一展宏图的期许,如范梈《曾教授赴韶州》之“到官定有佳声荐,瘴雨蛮烟细袪除”^{[5]1024},邓赉《送章宣慰征广海》之“乡关远近同明月,鼓角清雄压瘴烟”^{[7]617}。由此可见,受“送别”这一语境的影响,诗人在书写与“瘴”有关的内容时极少流露忧惧无奈的负面情绪,转而多以乐观的心态、关切的叮咛传达出对友人的思念、宽慰与期许。

另约90首诗歌从文化语境的角度较难归类,故下文以诗人心态为切入点进行简要分析。首先,苏天爵《千夫长梁侯寿诗》中有“岭峤海隅,蝮蛇瘴雾”^{[4]926},以此衬托梁侯征战边远之地的劳苦并赞扬其军事功绩。这一类型的诗歌中,诗人对“瘴”本身并无明显的情绪,而只是将其作为南方地区的独特景观进行呈现,以突出异域之“异”,进而为诗歌的表情达意服务,此为第一类情况。

“瘴”自被发现、被定义之时起便带有可憎之面目,令人望而生畏。元诗中亦可见诗人对瘴气与瘴病的恐惧,却也不乏乐观旷达的精神面貌。前者如揭傒斯《雨述三篇》(其二)中曰:“近闻闽中瘴大作,不间村原与城郭。全家十口一朝空,忍饥种稻无人获。”^{[5]1048}另有魏初《田家谣》言军士得瘴病之惨状:“五月军回未有期,不禁野瘴入枯脾。马头一骨还

家日,只有弓刀似旧时。”^{[7]169}虽只四句,亦令人不忍卒读。此外,还有刘诜《哭袁从义》中提及从义之兄殒身茅瘴,郭昂《过桃川宫》中写因瘴烟而致两鬓斑白,均可见诗人对于瘴气依然带有厌恶与惧怕的情绪。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诗作传递出了战胜瘴气的信心。如杨载《刘将军诗》中虽先言“湿热生瘴气,疾者无不死”^{[5]938},极力渲染交趾的环境恶劣,紧接着却叙写了刘将军如探囊取物般征服该国的光辉事迹,在歌颂刘将军、提议国家增强军事力量的同时也显示出人定胜天的决心。与此类似的还有述律杰的《题西洱海》,诗中言元世祖统一后的西南边陲“雨师清瘴疠,风伯扫氛烟”^{[7]334},极具乐观豪迈的精神气质。

除了以上所言,另有部分诗作提及“瘴”时感情恬淡温和,与“瘴”关联的不再是“异域”而是广泛的、无地域偏见色彩的“南方”。如程钜夫《寅夫示再登鼓山四诗仆虽不获同游然来诗不可虚辱次韵奉谢且致归班之钱》云:“解视归装还不俗,有诗曾酌瘴乡泉。”吴克恭(字寅夫)一登福建鼓山时,程钜夫便有诗与之唱和并定下重游之约,如今吴再登鼓山,程依然未能同游,只能通过读诗来弥补遗憾。在程的和诗中,诗人虽将福建称作“瘴乡”,却没有任何贬低之意,反而有以诗观当地风物的喜悦与满足。再如谢应芳《简无锡华景彰》之“少游乡里乐如此,应笑鸢飞瘴海天”^{[4]1257},侯克中《山行》之“晓开烟瘴山千迭,春满溪塘水一篙”^{[6]248},描绘的皆是和乐安宁之景,诗人不再闻“瘴”色变,“瘴”适用的诗歌语境也越来越多。

整体观之,与唐、宋诗人相比,元代诗人面对“瘴”时的厌恶与恐惧心理进一步缓解,保持平和、乐观心态者增多。一则,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理应有所改变;二则,元代是民族大迁移与大混居的时代,多民族间信仰、观念的碰撞以及游历的切身体会,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旧有认识;三则,“瘴”融入古典诗语后,其文化内涵的发展轨迹便不再依附于自然科学,如“瘴烟”“瘴雨”“瘴雾”等词语的产生源于瘴气常伴随此类自然现象出现,而在部分诗歌中,这些词语已与瘴气无涉,“瘴”只作为心境的投射抑或南方地域的代称而存在。

三、蒙古色目诗人与安南籍诗人笔下的“瘴”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民族而不是由汉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有范围最广泛、最具代表性的诗坛,有构成最丰富的诗人群体。元代含“瘴”诗

歌的作者中,有两类诗人群体值得注意,其一是蒙古色目诗人群,其二是安南籍诗人群。考察这两类诗人群体的诗作,对厘清“瘴”这一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自先秦时期便形成了文化正统观念,将诸夏文化圈之外的其他民族都当作化外之邦,又以五方对应,称之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认为,南方是中原人眼中的烟瘴之地,故唐代“瘴”与“蛮”往往对举,“瘴”的含义也有所引申,与“蛮”通义。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的观点则略有不同,他认为,瘴气与瘴病从概念产生时便带有对异域和异族的贬低色彩,它基于部分事实却更多的是夸大与扭曲,它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原政权在五方观及民族观支配下对南方的地理特征与族群特性的偏离认识”^[1]。然而,不论是源于概念产生时还是引申后,“瘴”长期带有对地域或族群(多指南方,也泛化至非文化中心的其他地方)的偏见与歧视色彩,这一点似乎已成为学界共识。以下有关蒙古色目诗人与安南诗人诗作的探讨,可进一步补充、修正这一观点。

其一,《元诗选》中涉及“瘴”的诗歌分属 97 位诗人,其中包括达溥化、迺贤、聂古柏、萨都刺、泰不华、雅琥 6 位蒙古色目诗人。现将六人含“瘴”的诗句列举如下^⑤:

瘴海日高方饮啄,龙江秋尽早相依。(达溥化《题孔雀》)^{[6]184}

运饷山溪阻,野战瘴云热。(迺贤《赠张直言南归》)^{[5]1461-1462}

云锁千山萧寺古,霜清百尺瘴江秋。(聂古柏《次韵宗道御史过峡》)^{[9]154}

持节曾临江汉上,分符又入瘴云间。(萨都刺《送管十班监宪除广西宣慰使》)^{[5]1256}

旌旗昼卷蕉花落,弓箭朝悬瘴雨收。(泰不华《送琼州万户入京》)^{[5]1733}

瘴疔肌肉消,盗贼梦寐惊。(雅琥《拟古寄京师诸知己二首》其二)^{[4]558}

元朝按照征服时间的先后将治下的人群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蒙古人是元朝的创建者、统治者,而色目人则是蒙元统治的基础。相比于安南人,尽管蒙古色目人的华化时间较晚,绝大部分始于元时,但其中在诗学上有可观之造诣者亦不在少数。由以上诗句可知,蒙古色目诗人使用

“瘴”的文化语境和心态与汉族诗人并无不同。达溥化诗中以“瘴海”呼应孔雀的栖息之地。迺贤以诗记史,反映了岭南地区因徭民起义而战火连连。聂古柏诗是与友人唱和所作,据明郭棐编撰的《岭海名胜记》,元郭孝基(字宗道,为御史)有《峡山飞来寺》一诗,峡山在广东清远县东,中通江流,聂古柏此句诗当是描绘这壮阔的自然之景。萨都刺与泰不华的诗作均属于前文提及的送别诗,萨都刺以“瘴云间”指代广西地区,首联既交代友人履历,又点明送别原因;泰不华笔下的“瘴雨”与琼州景观对应,诗中以“瘴雨收”突显万户的豪迈气概。雅琥诗中之“瘴”与贬谪相关^⑥,诗作前半部分写尽仙人逍遥,后半部分道尽自我孤苦,上文所引之句尤其可见诗人流放荆蛮的凄凉与忧惧。总体而言,若将以上诗作与汉族诗人的诗作进行比较,可见出二者对于“瘴”的运用甚为相似,蒙古色目诗人并未对这一概念格外留意或抵触,涵化时也没有自行增减其含义。

其二,《元诗选》癸集、壬集“属国”中收有“安南九人”的诗歌,其中四世陈仁王日燇、六世陈太子虚以及陈日燇相丁公文三人的诗作中使用了“瘴”,相关诗句如下:

节凌瘴雾身无恙,鞭拂春风马有骖。(陈日燇《送天使麻合麻乔元朗》)^{[7]1573}

马蹄万里涉溪山,玉节摇摇瘴雾寒。(陈虚《谢天使马合谋杨庭镇》)^{[7]1574}

九鼎尊安若泰山,时暘时雨瘴烟寒。(陈虚《再用韵呈天使》)^{[7]1574}

驿骑行行瘴露深,海边光照使星临。(陈虚《送天使撒只瓦赵子期》)^{[7]1575}

双袖拂开南海瘴,一声喝破下乘禅。(丁公文《陈郎中刚中自交趾还朝以诗饯行》)^{[7]1578}

安南,和日本、高丽诸邦一样,袭用华人文字制度已久,华化时间早且程度深,不仅用汉语写作,而且沿袭了汉语中带有贬义色彩的“瘴”概念。然从以上诗句中可以看出,安南人笔下的“瘴”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因其属于南方地区的特有气候,故也泛化为代指该地的熟稔化表达。陈日燇的诗句表达了对麻合麻、乔元朗不受瘴气侵害的美好祝愿,陈虚的诗句中可见安南瘴气弥漫,使臣出使甚为辛劳,丁公文的诗句则高度赞扬了陈孚的使臣气概。虽然瘴气确实有害,但在以上诗句中只将其归入不利的自然因素,不牵涉地域与族群,也就不带有偏见与歧视色彩。安南本就是瘴病多发之地,安南籍诗

人虽在送别元朝使臣的诗歌中表现出了较低的姿态,诗歌内容多为歌颂元朝及其使臣,亦不讳言本地瘴气的危害,但这种自谦绝不至自我贬低的程度,提及“瘴”时自然也尽力抹去其中于己不利的偏离认识。

其三,《元诗选》149首含“瘴”的诗歌中,出现“蛮”34处(34首),其中与“瘴”对举的有16处,包括瘴雨蛮烟(7)、蛮烟瘴雨(3)、瘴烟蛮雨(1)、瘴雨蛮风(1),以及“富良江涌瘴云湿,安化桥昏蛮雨来”^{[4]242}、“清风消瘴雨,丽月净蛮烟”^{[4]928}、“蛮烟秋暗桃榔洞,瘴雨春深茉莉田”^{[7]1052}、“美化移蛮俗,清风敛瘴烟”^{[6]427}等。这34首同时出现“瘴”“蛮”诗歌的作者中,有萨都刺、雅琥、聂古柏三位蒙古色目诗人,其中聂古柏有“蛮烟瘴雨霜天晓”^{[9]153}句,以“瘴”“蛮”对举。而《元诗选》所收“安南九人”的全部诗歌中均无“蛮”字出现,自然也不存在与“瘴”对举的情况。

综合上述三点,可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元诗中对“瘴”的运用沿袭唐宋,常与“蛮”对举,一定程度上带有对异域和异族的贬低色彩。其次,蒙古色目诗人群全盘接受了中原汉族诗人有关“瘴”的认识体系,包括其中的偏离认识。一则瘴气主要指向南方尤其是西南地区,而较少指向北方,“蛮”也与北方草原民族无涉;二则元时蒙古、色目人地位在汉人、南人之上,在族群与政治认同方面本就带有优越感,故蒙古色目诗人在接受并使用瘴概念时没有心理阻碍,也不介意将“瘴”“蛮”对举。再次,安南诗人群笔下的“瘴”并非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之反映,而只是基于南方景观书写的熟稔化的文化表达。一则“瘴”与“蛮”不同,“蛮”是华夷之辨下人为区分的概念,而“瘴”则建立在部分事实之上,具有一定的病理学、地理学依据;二则以“瘴”表达对异域与异族的偏见其实是中原汉族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换言之,古人并未有意识地将二者建立必然联系。故而,安南虽因长期华化而沿用了“瘴”这一概念,但在使用时有意避免触发其中于己不利的贬义,更不会主动提及带有鲜明歧视色彩的“蛮”而使二者通义,他们努力将“瘴”呈现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现象,一种南方书写中常见的中立的文化表达。安南诗人笔下“瘴”本身虽不为人所喜,却也不再是荒芜落后的代名词。

四、结语

“瘴”这一文化概念不仅为中原汉族使用,元代少数民族政权确立后,蒙古色目人同样使用,就连位

于瘴区之内的属国安南也因长期华化而沿袭使用。然不同地区采用的概念内涵是存在差异的,瘴区之外,无论是汉族还是西北少数民族,使用“瘴”时会一定程度上带有地域偏见与族群歧视,而瘴区之内的人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则会尽力抹去其中的贬义色彩,力求中立、客观的文化表达。

注释:

- ①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219页):“《元诗选》对于有别集传世且作品数量较多的诗人,主要是选其精华;对于散逸在选本、地理志、书画遗迹或笔记小说中的诗作,则尽可能地搜罗齐备,以保存文献。”
- ②数据参考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巴蜀书社2010年版)第五、六、七章。
- ③方回《孔府判野耘尝宦云南今以余瘴多病意欲休官因读唐书南诏传为此诗问其风俗》一诗中,诗题与诗句均出现“瘴”,“2处”归入“1首”。《元诗选二集》有李孝光《送陈杏林赴潮州医学教授》(第632页),《元诗选癸集》重出,作邓赉《送医学教授陈杏林之潮州》(第616页),据罗鹭《〈元诗选〉与元诗文献研究》考证,作邓赉诗比较可靠。另有3处出现在圆至、黎崱、陈麟三人小传中,不计入诗歌。其中圆至小传引《寄志胜上人》云:“瘴月入南去,花时雁北飞。”此诗不见于《元诗选》中。
- ④参见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7-276页。张文《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中亦有涉及。
- ⑤《元诗选》含“瘴”的诗歌中,有聂古柏3首,萨都刺4首,达溥化、迺贤、泰不华、雅琥各1首,这里限于篇幅,每人仅摘录1首。
- ⑥雅琥曾从天子近臣外贬静江路同知,后又迁福建盐运司同知。

参考文献:

- [1] 张文. 地域偏见和族群歧视:中国古代瘴气与瘴病的文化学解读[J]. 民族研究, 2005(3): 68-77, 108-109.
- [2] 永瑢, 纪昀, 陆锡熊,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 第23册[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 [4] 顾嗣立. 元诗选二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 顾嗣立. 元诗选初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6] 钱熙彦. 元诗选补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 [7] 顾嗣立, 席世臣. 元诗选癸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8] 彭定求, 沈三曾, 杨中讷, 等. 全唐诗: 第13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9] 顾嗣立. 元诗选三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责任编辑 于 湘]